

鏡像的流變：論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 英譯選本與西方重構

Evolution of Image: A Research on Antholog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nd Western Reconstitution

李 剛 (Li Gang) *

1944 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推出王際真 (Chi-chen Wang) 翻譯和編選的《現代中國小說選》 (*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此前斯諾 (Edgar Snow) 編選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 (*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於 1937 年由紐約 Reynal & Hitchcock 出版社推出，縱使比斯諾之選本遲出 7 年，王際真選本之意義在於，中國現代文學首次由美國的大學出版社以學院派的面貌呈現，並一度成為美國學生學習中國文學之權威教材。此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又相繼推出 4 部中國現代文學選本作為中國文學專業的參考教材，分別是：1971 年，由夏志清 (C. T. Hsia) 編選的《20 世紀中國小說選》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1981 年，由劉紹銘 (Joseph S. M. Lau)、夏志清、李歐梵 (Leo Ou-fan Lee) 編選的《現代中國中短篇小說 1919-1949》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1995 年，由劉紹銘、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編選的《哥倫比亞現代中國文學選集》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及 2007 年推出的仍由上述二

人編選的這部選集的第二版。此外，1976 年，劉紹銘、Timothy A Ross 共同編選了《來自臺灣的中國小說 1960-1970》 (*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出於對政治意識形態和當時大陸文學現狀的考量，西方這一時期對中國大陸文學作品普遍產生排斥心理，臺灣文學選本的推出則在一定程度上填充了這段空白期。

作為中國及中國文學在西方的研究重鎮，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選本的意義不僅在於向西方讀者推介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更甚之，作為大學教材揭見西方知識階層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選擇與態度。慮及「在跨文化交流領域，通過編排和重構等方式所創造的意義與價值遠遠大於其組成要素單個的總和。」¹ 哥大選本為中國現代文學提供了一幅世界視野中的西方鏡像，在這一鏡像的流變中，我們得以察知美國學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選擇與重構。在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漢語作家數十年來急希贏得世界肯定的心態暫得緩衝，然中國現代文學在世界文壇之整體地位仍未得到顯著改善。加深瞭解西方知識階層對中國現代文學之態度

* 作者為江蘇理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副教授，現為美國康乃爾大學東亞中心訪問學者。本文是中國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百年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研究」階段性成果。

1 陳橙，〈論中國古典文學的英譯選集與經典重構：從白之到劉紹銘〉，《外語與外語教學》2010. 4: 82。

與評價尺度，以鏡中之像正自我衣冠，對新一代中國作家而言無疑是一條拓寬寫作思路、思想深度之好路徑。誠然，哥大選本並不意味著確立了中國現代文學之評價標準，選本所選篇目也非完整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學之價值，但毋庸置疑，對這一系列選本開展研究，利於拓展我們的視野範圍，從而以更積極、更從容之心態參與世界文化交流與溝通。

一

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現代文學選本之權威性基於其深厚的歷史積澱。作為美國漢學的鼻祖之一，在卡本蒂埃將軍和他的中國管家丁龍的資助下，哥倫比亞大學早在1901年便建立了漢學系，而丁龍的故事亦成為哥大漢學系的一個傳奇——以丁龍名字命名的「丁龍漢學講座教授」在整個20世紀的百年中，以其嚴苛之標準僅僅聘請了4位漢學學者，而這4位無一不是西方漢學研究的巨匠。哥大最初的漢學研究聚焦於中國歷史、社會、經濟、政治等領域，研究人員與教師均為西方人。直至1921年，哥大漢學系才首次聘請一名中國學者，即哥大第一部中國現代文學選本《現代中國小說選》的編者和譯者王際真教授。身為傑出文學批評家、文學史家和翻譯家，王際真向西方介紹了眾多中國文學作品，其中包括《紅樓夢》較早的翻譯版本，他亦是最早將魯迅介紹至美國的學者。

王際真的到來，可謂拉開了中國現代文學海外研究和傳播的大幕。新近辭世的夏志清先生談及其撰著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時說，「那時美國除了哥大王際真外，簡直找不出另外一個教授曾翻譯過現代中國文學作品的，更無人稱得上是權威。」²以至彼時耶魯大學出版社為出版該小說史，在美國漢學界竟找不出一位富有學殖的具備審稿資格的鑒定人。王際真在美為研究與傳

播中國現代文學孤獨地披荊斬棘，立下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在美確立及首創之功。

王際真中國現代文學選本《現代中國小說選》共計21篇小說，分別為張天翼的《路》、《老明的故事》、《笑》、《團圓》，老舍的《村兒輟學記》，老舍的《黑白李》、《眼鏡》、《抱孫》、《麻醉師》、《柳家大院》，巴金的《家》（第36章），沈從文的《夜》，馮文炳（廢名）的《阿妹》，凌淑華的《太太》，茅盾的《春蠶》、《一個真正的中國人》，葉紹鈞的《李太太的頭髮》、《鄰居》，魯迅的《端午節》、《示眾》，楊振聲的《玉君》等。王際真編選該教材之時，確立了三條編選原則，第一、選擇那些在小說技巧上表現出色的作品；第二、作者在文壇上的地位形成了普遍共識；第三、作品需要聚焦當下的人民生活 and 中國問題。依編選之原則，寫實主義、諷刺社會之作品佔據該小說選的所有篇幅。夏志清後來在評價這部文選時認為：「只有21篇的《現代中國小說選》選入了老舍的5篇，張天翼的4篇，可見他對諷刺和喜劇的偏愛。」³

在夏先生看來，王際真之所以偏愛此類題材，是因為「王際真雖然1922年就離開中國，但他從根子上還是『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把魯迅看作民族英雄。」⁴故而，對旨在揭示、諷刺、暴露之作品，王際真尤為感興趣。另一方面，這類題材亦滿足了當時西方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想像，王際真在小說選前言中特別提到了一位美國教師在上海對教會學生發出的提問：「為什麼魯迅的《阿Q正傳》以及其他作品成了禁書？」在美國教師眼裡，這樣的作品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後的中國現實，把它們列為禁書，讓人匪夷所思。⁵

可見，王際真在選擇作品時，以諷刺、批判的題材作為首選標準不只出於他本人對文學的理解，同時滿足了那個時期西方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好奇與想像。在前言中，王際真特別提及，他所選這些小說皆為深受西方小

2 王海龍，《哥大與現代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頁64。

3 夏志清、董詩頂，〈王際真和喬志高的中國文學翻譯〉，《現代中文學刊》2011.1: 96-102。

4 同註3。

5 Chi-chen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p. VII.

說技巧影響的作品，由此不難見出，最初向美國學生介紹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之時，王際真已意識到，唯有介紹與他們的閱讀習慣大體一致的作品，才有可能獲得西方讀者的認同。這樣的編選原則影響波及 20 年後白芝（C. Birch）編選《中國文學選集：從早期至 14 世紀》時的思路，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白芝在其選集中宣稱：「首先，我們對文學的定義是現代西方式的，而非傳統中國式的，是狹義的，而非廣義的。」⁶

在王際真的小說選中，張天翼和老舍的作品在數量上幾佔一半，而這兩位的諷刺和喜劇的寫作風格多少能見出狄更斯、歐·亨利和海明威的影子，對於美國學生來說，閱讀之初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便於他們與作品產生情感共鳴，自然，他們評價中國現代文學的標準也來自於他們所閱讀的西方文學作品，在中國現代文學剛剛進入西方閱讀視野的年代，最快的融入辦法即告訴美國學生：「我們也是這樣寫作的」。王際真選本的編選原則即是將中國現代文學作品與美國學生的文學觀念與文化認知相互認證，這不失為一種聰明的做法。誠然，那個時代的中國現代文學深受西方文學影響，然接受影響並非為了求得西方社會的普遍認可，對這些作家來說，西方文學技巧僅是他們描述中國現實的一種手段而已，寫作的服務對象仍為廣大中國讀者，這與後來某些中國作家為迎合西方批評話語的認可，而有意使用西方敘事習慣的行為不同。

秉持如是編選原則，王際真所選 21 篇小說與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一貫想像存有相當差距，且不說老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成就如何，其知名度與老舍相較要差得多；馮文炳的作品《阿妹》也遠不如《竹林的故事》那般經典；至於魯迅，儘管王際真強調魯迅的作品已經被翻譯並出版單行本，但作為旨在向美國大學相關專業的學生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教材，並未編入《狂人日記》、《阿 Q 正傳》或《祝福》這樣的作品，其代

表性明顯不足，畢竟作為教材，作品的經典化無論如何是不得不考慮的。

二

王際真選本推出之後，恐因政治原因，美國高校再沒推出多少有影響力的中國現代文學選本，正式出版的更罕見。1954 年，麻省理工學院影印了一本名為《共產主義中國的小說》（*Fiction in Communist China*）的書，是一本研究文集，介紹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中國大陸眾多文學作品，這在當時，已屬難能可貴。王際真之後，中國現代文學在美國的研究後繼無人，直至夏志清的出現。

1961 年，夏志清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一部專著《中國現代小說史》，該書在出版之前便獲得了王際真的高度評價，他同時寫信給夏志清，希望夏志清能夠來哥大任教，信中不掩他對夏的欣賞：「當然是沒有別人比你更勝任的了」。在王際真的推薦下，夏志清於 1961 年赴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第二年，被聘為哥大中國文學副教授；1969 年又被聘為東方語言文化系中文教授，直至 1991 年退休。

夏志清本為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主要研究英美文學，常規的學術和工作路線是拿到博士學位後回中國教授英美文學。一次偶然的機會，夏志清加入了耶魯大學政治系教授饒大衛（David N. Rowe）編寫《中國手冊》的工作，就此開啟他在美國的漢學和中國現代文學之研究。《中國手冊》編寫於美國所謂「韓戰」時期，專為美國軍官參閱之用，其目的是為冷戰和反共服務。夏志清主要撰寫「文學」、「思想」、「中共大眾傳播」三章，在撰寫文學這一章時，夏志清提到他「把耶魯圖書館所藏的茅盾、老舍、巴金的作品都略加翻看。此外還有一批尚未編目的中共文藝資料，也放在辦公室裡翻閱。什

6 C. Birch & K. Donald eds.,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p. XXIV.

麼《白毛女》、《劉胡蘭》、《白求恩大夫》等小冊子以及趙樹理、丁玲的作品，倒真正花時間看了一些。」⁷儘管後來夏志清對參編《中國手冊》的工作「感覺沒有意思了」，但這段工作經歷直接促成和造就了他在海外的中國現代文學之研究地位。

《20 世紀中國小說選》是美國高校按照當時美國《國防教育法》要求，為本科生開設關於亞洲通識課程所編纂的文學選本教材。美國《國防教育法》於 1958 年頒佈，目的在於在冷戰與科技競爭的時代，通過高品質的教育，保證美國在人才培養和人才儲備上的優勢，在美國教育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教育法》要求加強國際和地區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研究。為此，美國一些著名的大學，如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史丹福大學、耶魯大學、威斯康辛大學等不僅聘請外國教師到校任教，還派遣學生到國外進行語言實踐、培訓和文化考察，收集有關外國語、世界文化、政治科學、國際關係、人類學和社會學等領域的材料。⁸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將傳統漢學發展為現代漢學——中國學，制訂了加強對現當代中國的研究方針，目的是獲取更多的「中國情報」，以利於政府制訂對華謀略。這從反面促進了研究的發展。⁹故而，對美國學生所進行的中國文學與語言的教學無疑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和政治色彩。

與王際真 1944 年《中國現代小說選》相較，1971 年出版的《20 世紀中國小說選》晚出近 30 年，書名似乎也更大氣，卻僅編入 9 篇小說，分別是郁達夫的《沉淪》，沈從文的《靜》、《白日》，張天翼的《春風》，吳組綸的《樊家鋪》，張愛玲的《金鎖記》，聶華苓的《王大年的幾件喜事》，水晶（楊沂）的《喀裡裡喀裡》，白先勇的《謫仙記》。對於未將魯迅、茅盾、老舍等名家列入這部文選，夏志清是這樣解釋的，「為了向西方讀者，凸顯中國小說的印象和活力，特別做了這樣一個

新的選集」。由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聲名並不顯赫的作家如水晶，其作品亦入選這個集子；至於聶華苓，儘管她後來在推廣華文文學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得以入選，與她在美國長期用英語寫作，在美國文學圈具有一定知名度大有關聯。王際真選本重在介紹那些利用西方技巧來描述中國現實的作品，意在讓學生透過這些文本瞭解中國和中國作家寫作的方式。

而夏志清在 1971 年所做選本顯然更具個人主觀色彩，如選本前言即見他對「政治」和「臺灣」這兩個關鍵字的強調。夏志清認為，1949 年之後，中國現代文學傳統並未在中國大陸延續下去，大陸文學成為共產主義機械的宣傳形式，加之北京外語出版社已經在美發行了大量 1949 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文學作品，故無需在他的小說選中加以介紹了。夏志清在前言中又用大量篇幅來解釋他為何選擇聶華苓、水晶和白先勇等臺灣作家的作品，其中一個原因與他的前輩王際真是一致的，即他認為那個時代的臺灣作家都接受過西方現代文學技巧的訓練，在技術上甚至比他們的前輩更成熟，在夏看來，當時的臺灣文學才是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正宗繼承者。

在編選《20 世紀中國小說選》的 70 年代，麥卡錫主義的影響已經式微，但 1949 年之後的大陸文學作品無一入選，這無疑代表了當時西方學界對現代中國大陸文學成就的普遍看法。當然，儘管存有這樣或那樣的政治分歧，無論是王際真還是夏志清均認同「五四」所開闢的中國現代文學傳統，這二人的態度也影響到美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並以此傳統為基礎逐漸形成了西方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評判標準。

三

1981 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推出由劉紹銘、夏志清和李歐梵共同編選的《現代中國中短篇小說選

7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頁 XXXV。

8 秦珊，〈一九五八年美國國防教育法述評〉，《廣西師院學報》（哲社版）1994. 4: 96-102。

9 宋紹香，〈中國新文學反映 20 世紀中國發生的革命變化——美國中國現代文學譯介、研究概觀〉，《文藝理論與批評》2012. 4: 70-80。

1919-1949》(*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此時，中美之間的政治障礙、意識形態分歧對於中國大陸文學在美國高校的傳播與教學影響已大為減弱，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在美國高校之發展亦日趨成熟，個人色彩濃郁的文學選本亦讓位於按照學科發展要求編選的選本。這一時期，不僅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其他一些高校和商業出版社均推出過中國現代文學選本，如1974年紐約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由Walter J. Meserve與Ruth I. Meserve編選的《中國現代文學》(*Modern Literature from China*)；1983年，紐約Hippocrene Books Inc.推出的由Lee Yee編選的《新現實主義——文化革命之後的中國文學》(*The New Realism-Writings from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等。在為數眾多的選本之中，影響力最大的仍首推哥大中國現代文學選本。

1981年哥大選本前言中這樣描述編選意圖：「當前的版本被設計成一個複雜的小說合集，代表了1917年文學革命以來最好的作品。作為一本教科書，我們的基本原理是，這本選集應該有助於學生理解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¹⁰選集推出之際，中國大陸新時期文學初露端倪，政治對文學的影響開始放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已有一批優秀作品推出，然此時，這些作品尚未得到西方文學研究者的關注，大陸文學界產生的變化也未被美國學術界及時捕捉。選本縱已明確表明所選作品發表時間截止至1949年，但編者仍強調說，1949年之後30年的中國大陸文學發展選擇了一條不同於「五四」傳統之道路，因始終秉持著「五四」文學正統的理念，他們自然認定，「1919-1949年的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最重要的階段」，繼續梳理和教授這一階段的文學，更契合美國大學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的需要。

相較之前的兩部選本，入選這一選本的作家和作品明顯增多，入選作品在文學史上的認同度也愈發一致。選集由20位作家共44部作品構成，分別是魯迅的《孔乙己》、《藥》、《故鄉》、《祝福》、《在酒樓上》、

《肥皂》，許地山的《商人婦》、《玉官》，葉紹鈞的《飯》、《孤獨》、《馬鈴瓜》、《秋》，郁達夫的《沉淪》，茅盾的《春蠶》，老舍的《新時代的舊悲劇》，凌淑華的《繡枕》、《中秋晚》，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沈從文的《柏子》、《蕭蕭》、《燈》、《靜》、《三個男子和一個女人》，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巴金的《楊嫂》、《將軍》、《沉落》、《豬與雞》，趙樹理的《福貴》，張天翼的《砥柱》、《中秋》，蕭軍的《羊》，吳組緇的《官官的補品》、《天下太平》、《樊家鋪》，錢鍾書的《靈感》、《紀念》，蕭紅的《手》、《家族以外的人》，端木蕻良的《遙遠的風沙》、《渾河的激流》，路翎的《棺材》，張愛玲的《金鎖記》。

從所選作家和篇目來看，基本涵蓋了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小說作家和中短篇作品。其中魯迅入選6篇，沈從文入選5篇，亦揭見西方學者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認識傾向：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的文學界，魯迅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均不可動搖；選本對沈從文的看重亦充分傳遞了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學的愛好、評判標準（或許也與夏志清對沈從文的個人喜好以及他與沈從文的親密朋友關係不無關連）。

誠然，這一選本與當時中國大陸的文學選本存有較大的差異，比如女作家丁玲的入選作品，大陸文學選本一般均選《莎菲女士的日記》，而哥大選本則頗有意味地選擇了丁玲在延安時期比較有爭議的兩部作品：《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在醫院中》；至於趙樹理的入選作品《福貴》更屬冷門，大陸讀者耳熟能詳的趙的作品是《小二黑結婚》。需要注意的是，在很多人看來，《福貴》仍是一部為配合政治宣傳所作的小說，哥大選本將這樣一部小說編入其中，究竟出於何種考慮，我們無法確知，後有學者分析說，「回到歷史語境會發現，在講述1946年及此前中國農村人命運的《福貴》中，『土改政策使二流子變成了人』抑或『革命重新改造人』並不是空話，它包含的是趙樹理、趙樹理的朋友以及本家兄

10 Joseph S. M. Lau, C. T. Hsia, and Leo Ou-fan Lee,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IX.

弟的真切人生經驗，它們並不輕逸。」¹¹可見，這一選本的編者們已經開始認真思考大陸文學與政治及現實之間的關係，不再簡單地為解放區和 1949 年之後的作品貼上政治工具的標籤，雖然這些作品免不了宣傳政治，但畢竟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作品在整體上是符合文學創作的價值標準的。

四

當前，在美國高校使用最廣泛的一部中國現代文學選本是劉紹銘和葛浩文編選的《現代中國文學選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這部選本分別推出了 1995 年版和 2007 年第二版。劉紹銘先後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夏威夷大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香港嶺南大學等高校，曾協助夏志清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並翻譯了部分篇章。葛浩文在中國現代文學界的影響則源於他對莫言小說《紅高粱》的翻譯，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葛浩文也一躍成為西方漢學界首屈一指的大家，而他也是 20 世紀哥大中國現代文學選本編者中唯一的一位外國人。這種中西合璧式的文學選集的編者組合方式，亦代表了當前西方學界在研究中國問題時的一種趨勢。

正如編者所言：「現代中國文學英譯本的選集通常被限定在特定的流派、地域或者時期，直到現在，還沒有任何一部選集可以覆蓋大陸、臺灣、香港三個區域，同時貫穿整個現代文學階段。」¹²從歷史跨度、取材範圍與文學類型諸方面來看，這部選集均做到了西方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長期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這兩個版本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均根據文體的不同，將 20 世紀中國文學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分別是 1918-1949、1949-1976 以及 1976 年以來的中國文學，每一時期均選這一

階段最具代表性的小說、詩歌和散文，只是由於篇幅的限制，未能收錄戲劇。1995 年版共計收錄了兩岸三地百年來 83 位作家包括小說、詩歌、散文共計 144 部作品；2007 年版則增至 91 位作家，作品則縮減至 130 部。

無論從收錄的作家、作品的數量，還是選集所關注的時間與空間範圍，這兩個版本的選集均充分表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在美國高校的成熟度較之過去已大幅提升，中國現代文學不再是出於社會、政治和軍事需要而存在的一門學科。恰如編者在前言中特地提到的：「當埃德加斯諾為他的《活在中國：中國現代短篇小說》收集材料時，他承認：即使現代中國沒有偉大的文學作品，但一定有科學和社會學的興趣，僅僅出於功利主義的目的，也需要拿來看看。」¹³可見，20 世紀初，西方對中國文學的價值和成就評價並不高，僅僅出於對一個東方大國的好奇，中國現代文學才得以在西方傳播。

經歷一個世紀的曲折發展，一方面，中國現代文學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作為一類文化現象和藝術現象，推薦給西方學者和讀者；另一方面，新時期以來，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在審視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時，西方學者摘下了他們的有色眼鏡，開始耐心、平等地看待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 1978 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文學。葛浩文與劉紹銘的中西合璧式的組合方式即充分體現了這一特徵，對中國現代文學感興趣的學者不再局限在由大陸、臺灣或香港移民至美國的中國人，更多土生土長的西方人開始關注這一領域。中國現代文學在新時期所取得的成就亦沒有令他們失望，「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作家已經勇敢地進入了多種可能的敘事新世界，他們可以規避政治禁忌，利用多樣的文學形式，如寓言、喜劇、現代主義、先鋒主義和最近的魔幻現實主義來描述中國的現實。」¹⁴

這樣的評價儘管依然隱含著某種政治態度，但對於

11 張莉，〈兩個「福貴」的文學啟示——以趙樹理《福貴》和余華《活著》為視點〉，《南方文壇》2009.2: 5-9。

12 Joseph S. M. Lau, and Howard Goldblatt.,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XXI.

13 *Ibid.*, p. XV.

14 *Ibid.*

新時期中國大陸作家的文學技巧與現實主義寫作還是表達了充分的認可，在美國教授們的心目中，在經歷了 50 年代到 70 年代那樣一個封閉的時期後，大陸作家終於打破了政治的例證規則，呈現一個美麗新世界。1995 年版選集的前言，特別提到了殘雪、莫言、韓少功、陳村、鐵凝、喬典運等中國大陸作家，並且認為：「那樣一個多元化的主題、多樣性的觀點、大量陌生化的情感和感覺的中國小說世界在最後一個十年開始顯現了。」¹⁵

20 世紀 40 年代，王際真教授編選《現代中國小說選》之時，中國現代文學正處起步不久的階段，歷經數千年古代文學成就之輝煌，西方文學觀念亦構成了對白話文創作的巨大衝擊，中國現代文學感受著來自傳統與西方之雙重「影響的焦慮」。焦慮情緒也存在於王際真等第一代向西方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心中，如何選擇篇目？哪些作品能得到西方權威話語的認可？早期的做法只能是遴選那些受西方文學影響明顯的作品，然後告訴他們，「我與你們沒什麼不同」；半個世紀之後，在劉紹銘與葛浩文的哥大選本中，儘管無法完全擺脫迎合西方讀者的心態，但是一個「我與你們不同」的多元化的中國文學面貌已經呈現。早期的選本因為有著西方學者的想像，且不得不滿足這種想像，故無法做到完全客觀；而在半個世紀之後，這種主觀的想像讓位於客觀的學術研究，於是「劉葛版」中出現了體現中國現代文學曲折歷程、但並不一定為西方學者所理解的作品，例如華彤創作於 1974 年文革期間的《延安的種子》。美國漢學家約翰·伯甯豪森說：「國外對中國革命文學和革命藝術的反應，從充滿敵意到阿諛奉承，形形色色，無所不有，但一個比較典型的反應卻是迷惑不解地聳聳肩膀。」¹⁶《延安的種子》顯然屬於令美國學者「聳聳肩膀」的作品。此外，即使在當下中國大陸的現代文學選本中

也很少出現的 80 後作家作品，也被「劉葛版」及時收入，如春樹的《生不逢時》。春樹是位 1983 年才出生的青年女作家，她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猶存爭議，但哥大 2007 年選本，已經大膽地將她的作品收入，這與她 2004 年 2 月成為美國《Time》雜誌的封面人物不無關聯，但在某種奪人眼球的光影背後，哥大選本看重的或許是從她身上可見中國現代文學之未來。

20 世紀以來，無論美國政府持何種政策方針，知識分子一般都有自己獨立的學術觀點和學術人格，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文學選本基本能夠不斷克服意識形態的桎梏，堅持客觀地看待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將中國現代優秀的文學作品介紹給西方的學生和廣大讀者。選本由薄到厚，作品積少成多，範圍不斷擴大，最為可貴的是與中國文學界對文本評價的共識也愈接近。從最初「我們」的迎合到後來「他們」的排斥，再到今天雙方的理解和認同，選本的歷史嬗變，勾勒出一條中國現代文學在美接受和轉播的路徑。無庸置疑的是，能夠經由這樣一所權威高校以教材的形式傳播和解讀中國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是一件幸事。

儘管，西方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態度、價值尺度、所述觀點未必完全正確，甚至有時過於極端，但畢竟這面西方之鏡，猶可作為參考，以正衣冠。2012 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文學界頗為驕傲（當然也值得自豪），但我們也看到，與充斥了西方文學作品的中國書店不同，在西方商業書店，翻譯自漢語寫作的文學作品依舊鳳毛麟角，能夠獲得一定銷量的更是幾乎沒有。自 20 世紀 40 年代始，哥大歷經數十年將中國現代文學成功引進美國校園，而今後如何走出校園，為更廣大的西方文學讀者所接受，則是今日之中國文學與兩岸三地作家挑戰的更大目標了。

¹⁵ *Ibid.*

¹⁶ 約翰·伯甯豪森、特德·赫特斯著，周發祥、陳聖生譯，《中國革命文學》引言，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國外中國學（文學）研究室編，《國外中國文學研究論叢》（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頁 112。